文化 ·教育

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

李章鹏

[摘要] 自 1902年底浙江留日学生同乡会成立调查部后，社会调查在清末形成了一股潮流。清末调查受日本的影响较大，与统计学关系较为密切，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调查主体和目的均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调查的结果也表现出一定的客观性。这些足以说明，清末的社会调查已具有某种现代性了，现代社会调查已在清末萌发。

[关键词] 清末　社会调查　肇兴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8587 (2006) - 02 - 0075 - 07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Rise of Modern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the Late of Qing

Following the Association of Zhejiang Students in Japan establishment of an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 in 1902, there was a gradual trend toward the use of social surveys in the late Qing. Influenced by Japan, late Qing social survey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statistics. The content of social surveys involved a variety of aspects of social life, the subjects and purposes were diverse, and the results were objective. All this indicated that a degree of modernity existed in social investigat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and modern social survey can trace its origins to this period.

所谓现代社会调查，就是人们为了一定的社会改良、社会服务或学术研究的目的，针对某种社会事实、社会现象或者是某个区域的社会概况，有意识地运用询问、实地观察或征集文卷等途径从事资料、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以求了解事物实情的一种感性认识活动，或者以此为基础而作进一步理性分析的认识活动。这样的调查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社会和学术现象，但目前的学术界对此尚缺乏整体上的考察和研究①。本文拟就社会调查在中国肇兴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以为引玉之砖。

一、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起始时间考

有关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起源或开端，目前的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是 1914年左右北京社会实进会从事的有关人力车夫的调查②。这一说法在社会学界比较流行，但未经严谨考证，难以为凭。另一种说法则出现在一些史学研究之中。这些学者的论述已有意或无意地说出中国最早的现代社会调查应发生于清末。例如王晓秋教授即指出，早在 1833年澳门的《中国丛报》(英文版)就已刊登有调查材料③。台湾学者王树槐则对 1897年传教士的一次烟毒调查进行了述评④。如果说这些论者所论的还是外国人在中国的调查，那么，胡旭晟的一篇文章已经把清政府民商事习惯调查(始于 1907年)作为主要论述对象之一了⑤。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从中可以发现，清朝末年中国境内已经出现了较为新型的社会调查。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清末就是中国现代社会调查

[收稿日期] 2005 - 10 - 15

[作者简介] 李章鹏 (1973—)，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2003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肇兴时期呢？

要判断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于何时，只依据中国境内最先出现现代社会调查的时间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中国人自己所从事的现代社会调查最早出现于何时？作为一种潮流的社会调查又起于何时？这些调查的现代性如何？本节只回答前两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留待最后一节讨论。

依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国最早提倡进行现代社会调查的要数阳湖赵子钦了。早在1877年，他就提倡延聘西人采用现代方法调查中国的矿产和矿政⑥。在此之前容闳、陈兰彬奉清廷之命到秘鲁、古巴等地查办华工事宜，容闳后来视之为社会调查⑦，陈翰笙等人也将容闳、陈兰彬的报告称为“调查报告”⑧。但实际上，这些报告通篇充满了“讯”、“供”、“禀”、“口供”、“禀词”等字样⑨，俨然是一篇司法调查书。

晚清时期最早把现代户口调查确定为自身职责之一的团体是1898年成立的湖南保卫总局，即“调查户籍为本局第一要意”。根据《保卫总局户籍章程》，其调查目的，“庶使本局一切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之事易于尽职，一切员绅吏役人等易于办事”。这已大大超越了仅为统治者征收税赋服务的古代户口调查。其调查内容，则包括家庭人口结构、家长的职业等，这与过去的丁、口调查也有很大的不同⑩。可惜的是，由于戊戌变法的迅速失败，此种调查亦随之而告吹。

事实上，最早将社会调查付诸实施的中国人可能是浏阳的黎宗鋆。他在1897年6月的《农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浏阳土产》的调查报告，谭嗣同为其作了序⑪。四年后，罗振玉在同一刊物上发表文章，阐明了土产调查的相关事项⑫。稍后，现代社会调查在中国逐渐增多，渐而蔚为潮流。

1902年底，浙江留日学生成立了同乡会调查部并制定了调查部则例⑬，对组织调查部的动机、目的，调查部的组织形式，及有关调查的要求和内容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是中国人为从事现代调查而成立的第一个组织，中国有组织的现代调查也由此开始。此后，湖北、江苏、安徽等省留日学生也相继成立了调查组织。在留日学生的推动下，中国迅速掀起了一个现代社会调查的潮流。

笔者曾对《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一卷和第二卷所收集的清末期刊作了一个简单的统计（下文的有关统计数字均以此为据）⑭，结果发现，在总共261种期刊中，曾经辟有调查栏目的有53种，占总数的20.31%；刊登过有关调查文章的有108种，占总数的41.38%。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社会调查的状况。

如果以这些期刊首次开辟调查栏或刊登调查文章的年份为准进行统计，则大体可以反映调查增加的趋势。从表一⑮可以看出，首次刊登有关调查文章的期刊数量自1903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一年，已有期刊开始创立调查栏目。

表一

首发年份	1899前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总计
专辟调查栏期刊数	0	0	0	0	5	7	5	7	4	6	7	10	2	53
刊载调查文章期刊数	5	3	3	2	7	9	9	14	6	14	10	18	7	107

事实上，中国人国内调查的数目⑯自1903年后就有了显著的增长，请参见表二。

表二

年份	1903前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合计
调查个数	7	45	34	56	111	126	177	138	198	65	957

1903年前的社会调查数总共只有7个，而1903年一年就有45个，后者是前者的6倍多。此后的调查数目虽然各年多少不同，但总数多达957个，是此前所有调查总数的135倍多。

从1903到1911年的短短几年内，中国的调查机构相继成立，宣传调查的报刊续有增加，而公开发表的调查成果也蔚然可观。可以说，这个时期社会调查已然形成一种潮流。

二、清末社会调查的总体状况及其主要特点

既然现代社会调查在清末的兴起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就应该进一步分析其总体状况和主要特点。

据统计，《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收录的期刊共刊登有关的调查消息和案例 1489个，有关社会调查的论说 73篇，公文 137篇，以及由调查引起的事件 5起，同时载有有关 45个调查机构（中国的 43个，日本的 2个）的文章。其中，调查消息和案例共包括中国人国内调查 957个，中国人对国外的调查 341个，外国人在中国的调查 57个和外国人的其他调查 134个。当然，现实中有关调查的事项要远远超过我们所统计的数目。

就国人对国内的调查而言，可以依据其所涉内容把它们分为社会（狭义）调查、政治调查、经济调查、文化教育调查等几类。参见表三：

表三

类别	社会调查	政治调查	经济调查	文教调查	其他调查	合计
数目	115	115	483	200	44	957

其中经济调查最多，约为全部调查的一半；文化教育调查次之；社会调查和政治调查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在经济调查中，以商贸方面的调查为最多，有 147个（含纯外贸调查 43个）；其余依次为农林业调查 94个，交通调查 74个，实业（不含农林业）调查 56个，物产调查 46个，矿产调查 36个，金融调查 17个和经济概况调查 13个。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社会调查发生于民初的城市里，而农村调查的兴起则是以后的事。事实上，清末农林业调查已达到 94个，如果加上物产调查中的农产品调查和商贸调查中的农产品贸易调查，数目更为可观。民国时期倍受关注的丝、茶滞销的问题，在清末已时有发生，这在社会调查中也有反映，相关的调查共 38个。

教育调查是文教调查中的最大项，共 181个，占总数的 90.5%。此外有关汉族及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调查也偶有出现，比五四时期北大提倡的风俗调查大约要早 13年或 18年。政治调查方面，依次为军事调查（56个）、制度方面的调查（43个）、税赋调查（16个）。社会调查方面，社会概况调查 62个，占总数的 53.9%，其余为人口调查（16个）、社会病态及救济方面的调查（15个）、宗教调查（9个）等等。这时个别调查者已开始关注一些弱势群体和劳动者的生计问题。妇女调查和生计调查不多（均为 3个），但确已发生。值得一提的是，1908年清政府发动了全国性的户口调查。这是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全国性户口普查，也是近现代史上为数很少的人口普查之一，其影响较为深远。

就地域而言，全国性的调查最多，共有 245个；其次为江苏（134个）、直隶（91个）、浙江（80个）、广东（67个）、东三省（60个）、四川（48个）、江西（39个）、湖北（35个），等等。除了今天的宁夏之外，其余各省区均有调查，但是多寡不一。这些调查大都发生在沿海、沿江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风气开通以及实行新政较为有力的地区，但是随着人们渐渐重视边疆的开发，清末对边地、少数民族的调查也时有出现[17]。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对东三省的调查，数量亦相当可观。

从调查者的角度来说，中国现代社会调查最早的提倡者和实践者都是民间人士，第一批现代调查机构也是由民间发起组成的。可以说，民间人士的热心对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始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在后来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逐渐显现出来，甚至有超越民间人士的趋势。不过，由于许多调查者具有官方身份，我们很难判断其调查哪些是职责所在，哪些是因兴趣而为，但是如果考察一下清末社会调查机构的公私性质，还是可以窥见问题的一二。

表四

机构性质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合计
公	0	0	1	0	5	1	15	6	1	0	29
私	1	2	2	2	0	1	0	1	3	2	14
小计	1	2	3	2	5	2	15	7	4	2	43

据表四，在 43个所统计到的调查机构中，民间性质的有 14个，其余为官方机构，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多。其中 1902、1903两年，纯为民间调查机构。1904年，四川成立了学务调查所。此为中国官方第一个现代调查机构。1906年，又有 5个政府调查机构相继出现，而 1908年成立的则多达 15个。这一年官方调查机构之所以大量出现，应与清政府机构设置变动有关。其时为了因应新政了解国情的需要，清政府宪政编查馆奏请在各直省设立调查局，在各部院创立统计处[18]。我们虽不敢说各省、各衙门都遵令而行，但政府调查机构因此而大量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新政的推展，清政府急于了解国际国内的情势，其各级组织陆续开展了与其职能相适当的调查。如学部及各省学务处调查教育，法部调查民事、商事习惯及民风民俗，商部考察商务，矿政局调查矿产，理藩部调查边政及少数民族风情，民政部调查户口和其他一些民政事项。为保证调查质量，清政府先后颁布了一些法令、政策，对调查统计工作予以规范。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1908年颁布的统计表总例[19]，要求各级政府机构必须严格按照格式进行调查统计工作。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社会调查的发展应具有积极的作用。

除了大量国内调查外，这个时期中国人也比较注重对国外进行调查。据统计，此类调查共有 340个，所涉领域较广，但以商贸方面为最多。

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在肇兴的过程中，除了表现出上述一般状况外，还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其一，受国外社会调查的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最初调查的动机系因受外人调查刺激而起。中国最早的两个调查机构——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和湖北调查部的成立动机都是如此[20]。即使在中国社会调查开始形成潮流之际，一些国人仍然感到来自外人调查的刺激：“吾浙素称富饶区域，久为外人所垂涎。兹日本派员调查，其用意固别有在。呜呼，吾浙官吏父老其亦知所谓调查之意否耶？”[21]二是学习、模仿国外调查。浙江同乡会组织调查部的目的是要达到与西方人一样的境界，“一省之中人人无调查之职任，人人有调查之义务”[22]。湖北调查部则明确宣告要模仿各国调查之公例，做到“海外留学生报告外事，海内士大夫研究内情”[23]。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现代社会调查的肇兴固然受到欧美的影响，但日本所给予的刺激恐怕更为直接。率先在中国使用“调查”这个字样的可能是日本人藤田丰八[24]，中国最早的几个调查组织均是由留日学生所组成。另外，在中国各报刊所介绍的 189个外国人调查中，属于日本人的就有 106个，占总数的 56.1%。如果考察 1903年前的情况，中国人对日本人所从事的调查的关注当更为明显。

其二，与争取利权息息相关。阳湖赵子钦提倡聘请西人调查矿产是如此，浙江、湖北、江苏、安徽等省同乡会调查部的成立也是如此。清廷对此也渐有认识。1906年，清政府为了与外人争矿权，要求各省迅速成立矿政调查局，调查矿产及其开采办法，并规定如有欲开采矿产的商民需该局派员勘探的，该局应给以便利[25]。商部成立后，鉴于中国农业与外人竞争不力，奏请调查棉花烟草，“窃维振兴农业，自以改良种植调查比较为入手之方”[26]。

其三，与清末新政密切相联。例如自清政府宣布实行教育改革后，教育的问题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清政府第一个调查机构四川学务调查所即由此而诞生。而且自 1903年起，教育调查在总数上都较其他一些调查为多。随着各种新政措施的推展，清政府愈来愈认识到调查的重要性，“调查各件，关系重要，得随时派员分赴各国各省实地考察”；“惟是考察各省事实以为斟酌损益之方，较之考察外国规制犹为切要”。所以，清政府决定广设调查机构，调查中

国各地情形,以为创立制度的参照。在实际操作层面,清政府每有重大举措,都强调必须先调查。例如法律改革,先有各地风俗、民事、商事习惯调查;边疆开发,有理藩部调查局之设;币制、盐政改革,有币制调查和盐政调查;风俗改革,有妇女缠足调查和禁烟调查;宪政改革,先后有自治和户口调查等。

其四,水平较低。一般的调查往往停留在对调查对象表面现象的描述上,所使用的材料有许多是间接材料或调查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实地调查很少,作周密准备进行学理上的调查几乎没有。许多调查者甚至连什么是调查都没有搞清楚。在一些报刊的调查栏里,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报道、法令制度、别人研究文章的摘录等等在今天看来明显不属于调查的东西。时人对此亦有所批评和纠正。例如沧江即认为1906年民政部在北京的户口调查严重失真[27],明水则对《币制调查局调查研究问题书》表达了强烈不满——"及读原件,而不禁大失所望","以一国最高之当轴,而思想识见瞀乱至此,欲吾国良币制之出现,正未知何日也"[28]。而针对投稿者把新闻当成调查的现象,浙江省留日同乡会调查部特地在《浙江潮》发布《特别征事》,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29]。

三、清末调查的现代性问题

然而,不管清末调查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都无法掩盖其内在的不同于传统调查的现代特征。

首先,从调查的主体和目的来说,清末调查起自个人的提倡,而渐及于政府各级机构,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与传统调查比较,已不再局限于政府以及由政府控制下的社会组织了。与此同时,调查者从事调查的目的也与以往那种单纯地服务于统治者征收税赋和劳役的情况大为不同,而是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并同样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主要是为社会改良和社会行政服务的,而每一个具体的调查,其目的则可能不一。例如1906年的京师户口调查是为了实施某种民政的需要,而1908年开始的全国性户口调查,其直接目的则是为宪政改革作准备。

第二,从调查的对象和范围来说,清末调查的对象已扩散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狭义)等领域的各个方面。例如湖北、浙江、江苏三省留日同乡会调查部均列有详细的调查事项。从这些的事项的分类来看,它们显然受到现代学术发展的影响,因为把社会生活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应是近代以来才开始出现的现象。而且,在《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和《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中,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调查"的概念,但它们显然是受了西方社会学的影响,背后都有一个关于"社会"的理解。湖北调查部提出调查的三个直接目的之一就是"述人群关系之重,引国民相爱之力"。浙江同乡会调查部更是明确提出要调查社会。在"社会"项下,它关于社会的进一步区分可归结为人口、地区贫富状况、社会团体、习俗、自治制度等五个部分[30]。江苏同乡会调查部虽然没有很全面地列举调查项目,但它所列举的项目较有特色,还特别强调对有关阶级(实际上是阶层)及其生计方面的调查[31]。很显然,它们关于社会的理解已非常现代了。

这个时期,已有人开始关注并试图调查下层社会的疾苦了。江苏同乡会调查部要调查的各个阶层中,至少有三个下等阶层是关注的重点。这时更是出现了以调查农民疾苦为主要任务的调查组织——农民疾苦调查会。事实上,清末也确实出现了下层社会的调查,如对嘉定农民的调查[32]。调查了解下层社会,是欧美现代社会调查产生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至今为止现代社会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从调查的方法、技术和自觉意识等方面来说,现代调查与古代调查的一个显著区别乃是现代调查意识的产生和坚持。中国人从日本那里引进"调查"一词,绝不仅仅是要丰富汉语词汇。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虽然总体水平有限,但他们确实模仿日本、欧美从事了各种各样的实实在在的调查。所以在清末,也许很多人对什么是现代社会调查认识得不够清楚,但当他们使用"调查"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一种自觉的调查意识。就整体而言,"调查"一词的引进及其广泛流传,似可说明现代调查意识已扎根于清末中国了。

现代社会调查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它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个"自在体"。自现代社会调查产生后,人们逐渐把调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来追求。经过不断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各种调查技术、方法和套路被发明出来,社会调查渐渐成为有着自身规范和特点的一门学问。社会调查在不断深化人们对社会认识的同时,自身也获得很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社会调查与一些相关学科如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往往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而这些学科反过来又规范、约束、丰富并促进着社会调查及其发展。在这方面,清末的调查与统计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统计式调查成绩也较为突出。1877年高延(De Groot)在厦门附近进行了类似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只是其成果用荷兰文写成[33],对清末中国人的调查影响不大。而阿瑟·史密斯的《中国乡村生活——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虽然在清末有过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作为调查成果而被人们注视的。其时还有人针对中国的具体问题拟就调查方法,如在《北洋官报》上发表的《调查学务统计办法》和《南洋兵事杂志》上刊登的《江苏安徽两省三角测量之方案》等,大约也算是调查方法中国化的萌芽吧。

清末调查与统计学关系密切恐怕要与其调查方法和理念的来源有关。在现代社会调查初起时的西方,有两类调查较有成绩,一个是以德国为代表的统计式调查,一个是以英国为代表的"Booth式"调查。由于清末中国的调查受日本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日本的调查又受德国的影响较大[34],所以清末中国的调查自然集中于统计式调查。到了民国,英美所给予的影响后来居上,中国社会调查的潮流自然也就随英美而转。可惜的是,研究中国社会学史的学者不肯花费精力理清调查的源流,他们对现代社会调查起始时间出现判断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清末调查的客观性。

在社会学界,Booth的伦敦调查一直被认为是早期现代社会调查的经典之作。依据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和Kathry Kish Sklar的观点,这种调查主要有四个特点:1、引进精确的贫穷线概念;2、试图精确地计算出处于贫穷线上下的人口;3、调查范围是对某一特定地区的全面调查;4、组织一支调查队伍进行实地调查[35]。其中的核心就是要通过实地调查精确地反映调查对象的客观真实,也就是要以可衡量的数字系统地描述真实。

如果以Booth伦敦调查的要求作为现代社会调查的衡量标准,那么几乎所有的清末调查都不具有现代性。当时很少有为单个调查组织专业调查队伍的,也很少有对一个地区进行全面的实地调查的,而同时满足Booth伦敦调查四个特点的更是绝无仅有。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论定清末调查不具有现代性,因为社会调查所追求的真实有两种,一种是现象的真实,一种是现象间有系统联系的真实,也即理论的真实。何况就是在当时的西方,社会调查也并非只有Booth式调查这一类。Martin Bulmer等人在同一篇文章中就提到了social survey和social investigation的区别。Booth的伦敦调查将调查对象分解成个人、家庭、亲属等有层次的单位来搜集数据,并作进一步的分析以求得现象、问题之间的联系,理应属于social survey,而依据我们的推断,清末中国的社会调查应可归为social investigation。所以,尽管清末社会调查(social investigation)并非对社会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其调查水平相比西方、日本的同类调查也差得很远,但并不意味着这些调查丝毫没有客观性,绝对的不可靠。这些调查毕竟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其所反映出来的某种客观事实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上在清末,正是这样的社会调查被人们视为发现客观真实的有力工具,"故中国而不欲改革也,如欲改革,必先于国中一切事物之性质、之状态而一一考察、一一研究,知病之所在而后可下药,知弊之所在而后可趋利"[36]。

另一方面,清末调查的整体水平不高,并不代表个别调查不足称道。陆溁的茶务调查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宣统二年(1910),陆溁到九江、湖北等处调查茶务,走访了口岸海关和各个厂商,就近五年各处厂商的种类和资本、茶叶的种类和种植、茶砖的制造和销售以及各茶销路、清政府所收税数作了详细的统计和比较分析,对中国茶业所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调查中,他不仅关注茶叶税收,对茶农的生计也甚表同情[37]。

总的来说,清末的调查虽然不曾以可衡量的数字系统地描述真实,它们所得数字的可靠性也必须加以审视,但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到整个社会调查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放到清末中国社会和学术背景中去考察,对其所表现出来的现代性应可作相当肯定的判断。

①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目前仅见刘育仁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燕京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 1936年学士毕业论文)和王万俊的《社会调查方法的研究与社会调查方法的运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方法的构成解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

②参见杨雅彬:《近代中国社会学(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68页;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7页;郑杭生、李迎春:《中国社会学史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76 - 77页。

③张注洪、王晓秋:《国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年版。

④王树槐:《鸦片毒害——光绪二十三年问卷调查分析》,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九期,1970年 7月。

⑤胡旭晟:《20世纪前期中国之民商事习惯调查及其意义》,《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 2期。

⑥赵子钦:《中国宜聘西人查矿说略》,《格致汇编》第 2年秋卷,1877年 9月。

⑦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国留学生之父的足迹与心迹》,沈潜、杨增麒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57—159页。

⑧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二,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579页。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中国官文书选辑》三,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 1043页。

⑨《中国官文书选辑》二,第 579 - 894页;《中国官文书选辑》三,第 1043 - 1059页。

⑩《保卫总局清查户籍章程》,《湘报》第 146号,《湘报》影印合订本,中华书局 1965年 1版。

⑪谭嗣同《浏阳土产表叙》,《农学报》第 3册 1897年 6月。黎宗鋆《浏阳土产表》,《农学报》第 3册、第 4册 1897年 6月;第 5册 1897年 7月。

⑫罗振玉《郡县查考农业土产条说》,《农学报》第 108册 1900年 6月。

⑬㉒㊱《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浙江潮》1903年 3月 18日。

⑭现已出版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共有四卷,其中 1 - 2卷收录的期刊,创刊时间都在 1912年前,而其后的两卷,均在 1912年之后。

⑮由于其中一种杂志创刊年份不能确定,所以此处刊载调查文章的刊物总数少了一种。

⑯这里的统计数字不包含那些显然不是调查但被有关报刊列入调查栏目的"调查",以下的统计都是如此。

⑰如雪生《腾越关之商务》,《云南》第 9号,1907年 9月 28日;《调查河套情形记》、《蒙古调查记》,《东方杂志》第 5卷第 7号,1908年。

⑱《宪政编查馆奏请饬各省设调查局折》、《又请饬各部院衙门设统计处片》,《北洋法政学报》第 52、53册,1908年 2月。

⑲《宪政编查馆奏定统计表总例》,《北洋法政学报》第 104册,1909年 6月。

⑳㉚参见前引《浙江同乡会调查部叙例》和程明超《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 2期,1903年 1月 29日)。

㉑《日人调查浙江风土之详情》,《华商联合报》第 9期,1909年 7月。

㉓程明超前引文。

㉔《浮尘子调查》,藤田丰八译,《农学报》第 16册,1897年 12月。

㉕《商部奏陈矿政调查局章程折》,《东方杂志》第 3卷第 2号,1906年。

㉖《本部奏调查各省谷棉烟草收获情形折》,《商务官报》庚戌第 12期,1910年 6月。

㉗沧江:《北京调查户口之报告》,《国风报》第 2年第 4期,1911年 3月。

㉘明水:《读币制调查局调查研究问题书后》,《国风报》第 1年第 11期,1910年 5月。

㉙《调查部特别征事广告》,《浙江潮》第 4期,1903年 5月。

㉛《江苏同乡会调查部公约》,《江苏》第 2期,1903年 4月 27日。

㉜《嘉定农人生计》,《江苏》第 7期,1903年 10月 20日。

㉝[荷兰]高延:《婆罗洲华人公司制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3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6年版,第 147页译者注。王铭铭《小政府与大社会——中国社会的社区观察》,《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 2期。

㉞高野岩三郎:《统计谈》,(东京)《法政杂志》第 1卷第 3号,1906年 5月 13日。

㉟Martin Bulmer, Kevin Bales and Kathry Kish Sklar, The social surv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880 - 194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9 - 20.

㊲参见陆溁:《调查国内茶务报告书》,版本不详。